

緒論

作為評論家的也斯

一、也斯的評論特點

也斯（梁秉鈞，1949-2013）是少數在創作及評論兩方面都對香港文學極其重要的作家，他用本名「梁秉鈞」寫詩、學術論文和翻譯，以筆名「也斯」寫評論、散文、小說，兩個名字都在文學史上留下重大貢獻。他的評論和論文是多個香港文學課題的重要參考，左右着相關的研究框架和基本認識，同時他又是具代表性的重要作家。翻開各種香港文學論文集，也斯是非常少數既以學者身份發表論文，同時又以作家身份被其他學者研究和談論的人，可見他在創作和評論兩方面的成就。

也斯的評論家身份的重要性不下於他留下的一系列作品。他自六十年代末起即在各大報刊及個人專欄上發表大量評論文章，內容題材遍及當代香港與台灣文學作品、西方文學思潮、電影及藝術等等。八十年代中葉以後又積極參與香港文學的論述生成和香港文學史的建立。以數量計，也斯在報刊專欄發表的短評和學術論文加起來遠遠超過其創作，卻至今缺乏有系統的研究整理。對也斯的研究一直集中在他的作品上，其中又以新詩和小說為主。小說方面，最多學者談論他對拉丁美洲魔幻寫實主義的挪用，以及他對後殖

民議題的探討。詩方面，他的都市詩和詠物詩是最受注目的，此外游詩、「生活化」和抒情詩的主張都備受重視。文學以外，他寫了不少電影評論，在他身後首次結集為《也斯影評集》（2014）。他與其他藝術媒介的越界合作也為人津津樂道。反觀也斯的評論很少被討論，從本書整理的「也斯研究資料」（見附錄三）來看，二百多篇單篇文章之中以也斯的評論為題者只有不足十篇，主要是《香港文化》及《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的書評，¹大部分已經收錄於《也斯的散文藝術》。²部分學者總結也斯的學術評論特點，例如楊傑銘認為也斯的文化評論比其創作「更能閱讀出他的內心意識，而現今的研究者往往將這部分作為研究他文學作品的輔助材料，卻少將其文化評論、研究論述視為一個整體的論述來作個別討論」。³又例如古遠清認為也斯的評論中以詩評最有分量、最出色，其特點在於方法視野，比較文學背景令他能夠從多角度透視文本，跳出單一文學地域和批評圈子，又多採取文化研究方法。⁴羅貴祥則強調也斯對香港文學和文化的研究開始於建制之外，其重要性也在於致力開拓評論的公共空間，認為也斯始終較為偏重作家的身份，使他成為非典型「學院建制」中的學者。⁵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其中一節把也斯列入「雙棲批評家」的「作家——批評家」類別討論。⁶這些文章都準確地把握也斯的評論家身份特點，但是與也斯建設香港文學史的重大貢獻

1 書評類主要是以下五篇：（1）黃紐（黃淑嫻）：〈試評也斯的《香港文化》〉，《讀書人》第4期（1995年6月），頁92-96。（2）梁世榮：〈兩位也斯——評也斯的《香港文化》〉，《星島日報》1996年1月8日，D6版。（3）艾曉明：〈後殖民地處境與香港身份辨析——香港文化研究書刊述評之一〉，《香港筆叢》第7期（1996年3月），頁165-171。（4）石磊：〈「吾道孤」的寂寞——也斯及其《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明報》1996年4月7日，D10版。（5）李萬（馮偉才）：〈香港的文化空間——評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讀書人》第14期（1996年4月），頁42-45。

2 見曾卓然主編：《也斯的散文藝術》，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

3 楊傑銘：〈「也斯障礙」：從《香港文化十論》看也斯書寫位置的去中心〉，《百家文學雜誌》第24期（2013年2月），頁29。

4 古遠清：〈細察現象，剖析本質——評也斯文學評論〉，《香港文學》第127期（1995年7月），頁63-68。

5 羅貴祥：〈邊界視野——也斯的香港文化研究〉，《字花》第42期（2013年3-4月），頁22-25。

6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頁569-573。

相比，這樣的研究規模仍然是不足的，本書即為此方面的起步嘗試。

身兼文學家和評論家的身份令也斯不滿足於學院式評論，而發展出甚有個人特色的、界乎散文和論文、文學評論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寫法。已經有部分文章總結出雙棲身份給也斯帶來的特點。溫儒敏可能是最早從這個角度分析的學者，他認為也斯「隨感性的富於詩的韻味的詩評」最具個人特色，「他的文學批評非常個性化」，「和那種以闡釋、判斷或倡導為要旨的批評是不同的」。也斯擅長「從自己的審美感受出發」，在評論其他詩人時發揮他本身也是詩人的優勢，通常談自己的閱讀感受來切入評論對象的特點，而較不着重「對作品價值的具體評估」，其「批評文體也富於散文詩似的抒情的格調」。⁷這不只是指也斯的短評文章而言，溫認為也斯的學術論文「也離不開感受」，「梁秉鈞是很注重將自己微妙的閱讀感受上升到理性分析的」。⁸這些都是對也斯的評論非常準確的觀察和概括。曾卓然則注意到也斯的文藝短評和他的散文具有同樣的「生活化」風格，他主要分析也斯的評論如何兼顧散文藝術的經營，例如藝術評論結合人物散文的寫法、「平視的角度」、「親切的語氣」，「散文的感性和批評的理性在這兒統合」。⁹黃淑嫻形容也斯的《香港文化》「是幾種不同立場的磋商與交涉（negotiation）：嚴肅文藝與流行文化、系統概括的文化理論與實際文學藝術的例證、嚴謹的學術文章與深入淺出的抒情說理的散文」。¹⁰這些文章都指出了也斯的評論特點與他的文學創作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不過，散文和評論的越界寫作同時為也斯帶來不少非難。例如同樣的特點曾經被梁世榮斥為「不太留意論文的基本要求」，流於主觀和武斷。¹¹也斯回應《香港文化》一書受到的批評時自嘲：「書出來以後搞創作的人覺

7 溫儒敏：〈香港文學批評印象（節錄）〉，曾卓然主編：《也斯的散文藝術》，頁44-46。原文分上下篇於刊《香港文學》第49期（1989年1月），頁31-34及第50期（1989年2月），頁33-39。

8 溫儒敏：〈香港文學批評印象（節錄）〉，《也斯的散文藝術》，頁47。

9 曾卓然：〈也斯如何在散文中談文說藝〉，《也斯的散文藝術》，頁202。

10 黃紐（黃淑嫻）：〈試評也斯的《香港文化》〉，《讀書人》第4期（1995年6月），頁93。

11 梁世榮：〈兩位也斯——評也斯的《香港文化》〉，《星島日報》1996年1月8日，D6版。

得我太理論性了；但誰料到讀社會學的書評人反又嫌我寫得太文藝化，太多實際的例子而不夠理論化」。¹² 也斯這篇回應〈散文與生活態度〉本身就採用書信體，以來自旅行的隱喻「越界」形容自己的評論實踐以及一種批評的位置與視野。¹³ 此文以抒情散文的筆法，向質疑學術評論價值的友人提出異議，申辯自己對寫作評論的看法。他自言：

我從一個以創作詩文為主的作者，在這一階段好似越出原來文類的界線，變成在創作中包括評論的思維、甚至有時變成一個以寫作評論為主的作者，這未必是社會文化干擾了個人的詩情，是生活在這文化空間，自然需要直接或間接作出回應。¹⁴

但是由創作「越界」到評論，令他遭受不少質疑：

因為自己的雙重身份，卻經常被人質疑：「你是讀理論的，你一定是根據理論來寫詩！」其實我並非如此。要不就是被人認為：「你的理論一點也不夠理論化！」有時理論可以協助我們看得更闊，有時理論卻打消大家閱讀作品的需要。若把詩與文化理論之間的關係開放出來討論，想對寫詩的人與做文化研究的人都有意思。¹⁵

如果要衡量和評價也斯在建設香港文學史上的貢獻，同時也必須回答他的這些評論特點對於文學史論述的影響，例如他的論文寫法有何特點？他的學術論文與他個人的文學經驗有怎樣的關係，後者如何形塑了他的論述？

12 也斯：〈散文與生活態度〉，《越界書簡》（香港：青文書屋，1996年），頁176。原題〈從文學創作到文化評論〉，《讀書人》第4期（1995年6月），頁88-91。結集版本經過不少修改增補。

13 也斯：〈散文與生活態度〉，《越界書簡》，頁177。

14 同上注，頁179。

15 魏家欣、郭麗容紀錄及整理，張美君、葉輝、洛楓、也斯對談：〈在時間伊始的四重奏〉，梁秉鈞著，奧城（Gordon T. Osing）及梁秉鈞翻譯：《形象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55。

他的越界特點如何輔助其論述？這些都是本書嘗試探究的問題。

本書將處理筆者能夠取得的所有評論材料，首先是也斯的報刊專欄，主要包括《香港時報·文藝斷想》（1968年7月24日—1969年4月26日）、《快報·我之試寫室》（1970年？—1977年5月14日）、《快報·書與街道》（1977年5月15日—1978年8月15日）、《星晚周刊·雜文集》（1974-1975年）、《信報·觀景窗》（1986年12月5日—1987年11月30日）、《大公報·文學筆記》（1988年3月1日—10月15日）及《大公報·比較文學》（1988年10月17日—1989年10月30日）。其次是散見報紙雜誌上的單篇文章，包括《中國學生周報》、《星島日報·大學文藝》、《號外》等等。另外還有他參與編務或創辦的刊物《文林》、《四季》、《大拇指》，再加上也斯全部的已結集評論。

在以上評論材料之中，以他早期的專欄文字最為缺乏整理。他曾經筆耕過的報刊園地不計其數，但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專欄文章之中，只有小部分已經結集。主要原因是部分材料例如早年的《快報》若非私人收藏家借閱捐贈，可說是無法得見。¹⁶ 按本書整理的「也斯六七十年代部分報刊專欄文章編目」統計（見附錄二），總共2,347篇報刊文章之中，只有445篇曾經結集於《灰鴿早晨的話》（1972）、《神話午餐》（1978）、《養龍人師門》（1979）、《山水人物》（1981）、《書與城市》（1985）、《城市筆記》（1987）、《街巷人物》（2002）和《也斯影評集》等書，即只有約19%結集成書。這些專欄文字由生活雜感、散文、連載短篇小說、電影評論、劇評、書評、詩評到遊記等等包羅萬有。雖然限於專欄篇幅，多是一千幾百字的短文，難以非常詳盡深入，但是因為每日刊出，數量龐大，其特點在於連續而長時間的大量材料，蜻蜓點水卻涵蓋廣泛，便於觀察文壇的歷時變化，例如某類文藝潮流的興衰，以及也斯個人文學觀的形成與變化，是非常有研究價值的材料。而且與結集之後的整齊面貌不同，專欄形式鼓勵他「借題發揮」，以他的譯介文章為例，由於專欄文字的跳躍性和隨意性，他經常由譯介內容馬上跳到評論當前文壇現象，這些文章通常包含一部分翻譯或內容概括評述，再

16 香港大學所藏《快報》最早僅至1976年10月，本書所用《快報》材料皆由陳進權先生私人收藏、承蒙許迪鏘先生慷慨提供，謹此致謝。

以暗示或直接批評的方式回應當前發生的文學論戰或思潮趨勢，有利於我們側面了解六七十年代的文壇情況。早期材料的另一特別之處在於其中充滿了未定型的想法，又是許多重要主張的萌芽時期，加上也斯是很早成名的作家，專欄就是其早期想法的忠實記錄，常有遺珠之樂，可以對照八十年代以後的學術評論，比較其想法的變化。他認為「專欄的特色，是它可以面對更多的讀者，更有時間性」，而自己是「在寫專欄和寫論文的人生之間徘徊」。¹⁷ 簡言之，他早期的專欄材料如果得到更多整理，應可補充他的論文觀點。八十年代以來的專欄則整理得較好，大多已經結集成書。其中較有趣的則是他在學術論文以外，也在報章雜誌上以短評回應各種會議見聞、點評最近讀到的香港文學評論，又以個人回憶的方式整理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史料。這些專欄可以補充已結集的文章，同時是重回文學史現場的最佳方法。

二、也斯與香港文學評論史

要全面地掌握也斯的評論特色，¹⁸ 需要衡量他在香港文學評論史上的位置和重要性。而要做到這點，首先需要有整全的香港文學評論史，或至少

17 也斯：〈專欄與論文〉，《大公報》1988年10月15日，第22版。

18 「評論」與「批評」似乎意涵相近，有學者討論與比較過兩詞的差異。楊松年認為文學「評論」較「批評」一語更適合中國文學傳統，「批評」一詞，乃指對人、物與事之具體評論，而其普通用法，更包含針對評價對象之缺點，予以抨擊（反手擊之引申）之意，這實在不能包括中國那些討論文學問題，評釋文學作家與作品之著作，並表明這些著作之特色」。楊松年：《中國文學評論史編寫問題論析：晚明至盛清詩論之考察》（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頁2。陳國球則指出「批評」一語在五卅以來是對「criticism」一詞通行的翻譯，並被五四知識分子視為中國文學的「缺項」。陳國球：〈導言〉，《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評論卷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43-48。現代中國最早的幾部《中國文學批評史》例如陳鐘凡、郭紹虞、羅根澤都是使用「批評」一詞的，參考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中華書局，1927年。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典，1958年。

由此引申，「批評」一詞或可視為象徵了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主宰中國文學評論的處境，而晚近為「評論」一詞翻案正好代表了華文研究界對於長期依賴西方方法的反思而返歸中國傳統文論。為了包納更多的評論體式，並與「批評」一語的另一用法（「批判」之意）作出區分，本書主要使用「評論」一詞。

其基本框架。一部文學評論史應該是怎樣的？何恆達（Peter U. Hohendahl, 1936-）在《評論的體制》（*The Institution of Criticism*）提出文學評論史值得像文學史一樣被嚴肅研究，一部文學評論史應該檢視文學批評在整體文學之中的結構位置，正視評論對文學的重要性，不是「新批評」式關注作品本身，而是建立一部體制史，展示文學及文學評論的生產、散播、接受的體制的變遷，綜合考慮媒體、經濟、社會的改變與評論體制的關係，文學理論及典範的生成條件等等。¹⁹ 迄今唯一的一部香港文學評論史是內地學者古遠清在1997年出版的《香港當代文學批評史》，全書結構以文學思潮及文學論爭為主，輔以主要批評家及其作品的概述。這種寫法以史料概述為主，羅列評論家、作品與事件，而較不能看出主要的趨勢轉變，也沒有突出香港文學批評的特點，何以值得獨立於內地及台灣文學批評史來討論。²⁰ 陳國球在他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評論卷一》提出其評論史構想，「本卷選輯的內容重點是在香港出現以至發生作用之文學理念思潮以及相關之評論實踐」，²¹ 在編輯上特別着重整理主要文學論爭與內地當時討論的關係，以及由文學評論看西方文藝思潮和概念在香港的引入，以資與鄰近地區的引入情況比較，突出香港的特色。在另一篇與《大系·評論卷》相關的論文〈香港文學的「曾經」與「可能」——香港早期文學評論的流轉空間〉中，他檢視在五卅運動中的香港文人身影，指出香港文壇與五四當時情況不同，並未嚴格區分白話與文言、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而且早期的香港文學評論已經有「草創期的中西比較文學練習」，²² 又率先引介西方當代文學，充分展示香港的地緣優勢，「培育出一些政治和文藝思想

19 Peter U. Hohendahl, "Prolegomena to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Institution of Critic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226, 232-241.

20 此書總體來說資料翔實，對各種立場的評論家都有平均論及，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但是書中部分選材值得商榷，例如把「多元化的魯迅研究」等對香港文學評論發展較次要的議題當成重點討論，書後附錄有不少史實訛誤，並頗為倚靠香港中國筆會及黃維樑提供的資料。

21 陳國球：〈導言〉，《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評論卷一》，頁72。

22 陳國球：〈香港文學的「曾經」與「可能」——香港早期文學評論的流轉空間〉，《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339。

都非常前衛勇進的文化人」。²³ 這種香港本位、結合比較文學視野的評論史方法很值得取效，對於分析及研究也斯的評論非常有助益。

戰後香港評論發展到底經歷了甚麼變化，或者可以參考華文學界的同類型研究成果。目前研究界對於中國古典文學評論史的整理和著述已經非常豐富成熟，中國現代文學評論史的著作數量相對較少。²⁴ 部分學者以文學理論及典範的轉變為線索整理現代文學評論的發展情況，較易把握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評論體制的變化。例如柯慶明的《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結合了比較文學視野，由晚清的梁啟超、王國維開始，歷述多位評論家對何謂文學性的詮釋，扼要地概括其批評方法、評價範式及新觀念的出現與更替。戰後的論述重點則放在台灣的新批評及比較文學的發展上。²⁵ 又例如楊宗翰《台灣新詩評論轉型研究》認為「台灣新詩評論迄今至少發生過三次重大轉型」，²⁶ 第一次是六十年代新批評的引入，代表人物是顏元叔與李英豪，第二次是七十年代的比較文學發展，代表人物是葉維廉與張漢良，²⁷ 第三階段則是八十年代以來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百花盛放，或應總稱為「文化研究」主導評論的時代。²⁸ 這個基本框架不只適用於台灣，也適用於形容戰後以來香港文學評論的大致情形。

參考以上幾部著作，可以這樣草擬初步的香港文學評論史框架：七十年代初新批評引入香港和台灣，加上香港大專院校開始開設新文學課程，

23 同上注，頁 342。

24 例如較有規模者可參考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該書介紹了王國維以後至四十年代共十幾位主要評論家提出的評論學說。

25 柯慶明尤其着重闡釋比較文學視野中，西方與中國模子此消彼長的趨勢：「從王國維開始，現代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大抵是以西方的文學觀念作為討論中國文學的基本模子〔……〕到了葉維廉才以一個典型的中國文學的觀念和理想〔……〕來從事中英文學的比較。」因此全書最後一章致力整理「從中國文學創生的一些理論思維」。柯慶明：《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台北：大安，2005 年，第二版），頁 131。

26 楊宗翰：〈顏元叔與台灣新詩評論轉型〉，《當代詩學》第 3 期（2007 年 12 月），頁 27。

27 楊宗翰的博士論文集集中在第一及第三階段，第二階段可惜未見論述。參考楊宗翰：《台灣新詩評論：歷史與轉型》，台北：新銳文創，2012 年。

28 楊宗翰：〈顏元叔與台灣新詩評論轉型〉，頁 27-28。

學院派批評家的隊伍開始壯大，改變了前此以作家兼任評論家為主的情況；同時另一道評論潮流則是現實主義，但是情況仍待整理。八十年代在回歸問題的脈絡下，比較文學成為顯學，同時文化理論主導文學評論，後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等等都成為評論者尋索香港身份的重要方法。報刊園地遠不如七十年代繁榮，但是仍有刊登長篇評論的篇幅，直至九十年代報業減價戰之後，報刊園地大幅萎縮。與此同時，九十年代文學評論逐漸轉移到學院的專業評論者手上，學者忙於應付學院的評比要求，跨出學院門牆、兼顧非學院評論的人日益減少。以上的情況與何恆達所說的西方情況不無可比之處，評論一方面受消費市場影響，另一方面又由精英化的學院研究主導。何恆達指，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產階級的興起及隨此而來的書業的轉型，令文學評論漸漸整合為書業消費行銷其中一個環節，另一方面則是學術評論拒絕評論當代文學，學院以艱深的理論研究現代主義文學經典，與大眾漸行漸遠。²⁹ 他認為可行的方向，是重新恢復評論的公共角色，自消費工業及大眾傳媒手中奪回公共言論空間（public sphere）。雖然西方書評生產的情況與香港大不相同，但是評論的學院化趨勢卻有相似之處。也斯一生致力於「越界」評論，其用意與此相通。

也斯可以說見證了上述各個階段香港文學評論場域的轉變。他從寫作專欄開始就非常關注文學評論的問題，這十分有利於我們觀察六十年代中葉至七十年代初香港及台灣的文學評論生態。在「新批評」引入台灣之前，也斯經常批評當時的文學評論不被重視，而且標準混亂，³⁰ 與顏元叔約略同時期對台灣文學評論狀況的批評相近。³¹ 也斯特別點名批評羅門、張默等詩

29 Hohendahl, "Introduction," *The Institution of Criticism*, 11-19.

30 也斯：〈放任中的準則〉，《快報》1973 年 6 月 1 日，頁碼從缺。

31 顏元叔在引起論戰的文章〈颱風季〉中直斥「台灣既有之文評，大抵皆吹捧咒罵者流」，因此楊宗翰認為這場論戰其實是關於引介新詩批評方法的。見〈顏元叔與台灣新詩評論轉型〉，頁 30。也斯不只一次批評香港的評論只是小圈子酬酢或謾罵的活動，缺乏客觀公平的評論，所見與顏元叔相似。見也斯：〈不公平的現象〉，《快報》1972 年 8 月 27 日，頁碼從缺；也斯：〈什麼是批評〉，《快報》1974 年 3 月 29 日，頁碼從缺。

評家，反而推許葉維廉運用「新批評」的技巧和結構分析，³²又讚賞顏元叔在建立文學批評標準上的貢獻。針對顏元叔1972年引起的「颱風季論戰」，也斯支持顏元叔具體切實的評論態度，反對另一方的詩人所持的反批評、反分析的態度。³³後來顏元叔與夏志清筆戰，也斯仍然認為不可抹殺顏元叔在台灣批評界的貢獻，他創辦《中外文學》和《淡江評論》，開創比較文學的風氣，運用「新批評」等不同的西方理論，「開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向，踏實求解求感，否定了以前印象式的感情泛濫。他評新詩不限於一社一派，不囿圈子，態度上是公正的」。³⁴在西方，「新批評」和現代主義的關係密不可分，在台灣卻出現了用「新批評」來批評現代主義的情況，最後促成了現代詩的檢討風潮。³⁵對於現代主義及七十年代初現代詩的大規模反省批判，也斯頻繁發表意見，一方面樂見文學評論的發展，³⁶另一方面駁斥他不同意的觀點，從中醞釀了他對現代詩和「生活化」的看法。同時也斯又多番批評現實主義評論，側面反映了在內地文革影響下勃興的現實主義如何掀動香港的文學評論風氣。也斯抨擊這類評論變成扣帽子的活動，暴力地否定文學，³⁷他強烈批評現實主義的主張，對於台灣鄉土文學論爭之中出現的評論暴力也不表認同。³⁸在他當時對外國文藝的譯介之中也經常可見

32 「台灣的文學批評也相當混亂，羅門或張默的詩評，洋洋灑灑數萬言，也不知說了點甚麼出來。忽然又是心靈的放射，忽然又是潛意識的飽滿，簡直把人看得七葷八素。」也斯：〈一個時鐘〉，《快報》1972年1月29日，頁碼從缺。

33 「……許多現在的中文詩評，翻開書本，『心靈投射』，『靈魂上昇』的怪名詞跳了出來，不然又是中國的梵樂希，東方的艾略特，沒有甚麼話好說。……實際針對某人的詩作評的，卻少有佳作。白萩、余光中等人的批評，比較合理。顏元叔評詩也老實，懂一分就說一分，毫不取巧。」也斯：〈關於詩評〉，《快報》1973年8月16日，頁碼從缺。

34 也斯：〈直言的人〉，《快報》1977年6月25日，頁碼從缺。

35 楊宗翰：〈顏元叔與台灣新詩評論轉型〉，頁39-45。

36 例如他認為「《中外文學》的創立，代表了台灣文壇近年這一類反省性的批評態度」，撇除一些意氣評論，「更多的人關心詩，並提出批評，本來是好事」。也斯：〈塵埃尚未落定〉，《快報》1973年9月8日，頁碼從缺。

37 也斯：〈等看你的〉，《快報》1973年9月10日，頁碼從缺。也斯：〈談「文季」〉，《快報》1973年9月29日，頁碼從缺。也斯：〈拳師與沙包〉，《快報》1974年9月23日，頁碼從缺。

38 也斯：〈鄉土〉，《快報》1977年10月21日，頁碼從缺。文中也斯批評因着鄉土文學潮流，「現在鄉土二字好像變了靈符，甚麼都管用」，該年夏天的鄉土文學論戰中「鄉土」被視為「正義的代名詞」，以至到了論戰後期，「不少人根本不談正題」，只是藉着「鄉土」二字互相指責而已。

借題發揮抨擊現實主義，或故意介紹與之針鋒相對的藝術流派等等。³⁹這一段歷史目前相對較少被整理，但是由也斯表達的憂慮來看，現實主義評論的影響力相當大。可以說也斯在成為學者之前，已經是相當積極的評論者了。

八十年代以來，也斯不再只是作家，更是晉身學院參與論述的形構、學科的建立等工作。適逢後殖民主義掀起熱潮，香港作為西方最後剩下的少數殖民地之一，本地及海外學者紛紛從後殖民角度討論香港，也斯在這股理論思潮中被視為香港文學的代表作家。這同時是他建立香港文學史論述的階段，把前一階段的個人文學經歷轉化為學術論述。早年的實踐和經歷在他的論述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如何影響了他的文學史論述，是非常值得探究的問題。而他在文學評論場域的角色變化，又與香港文學的學科建立密切相關，稍後會從場域理論再加以分析。

三、歷史與論述：對香港文學史體式的想像

本書把也斯的香港文學評論稱為「文學史論述」，是因為也斯的確並沒有寫出一部「香港文學史」，但是他的文學評論大多具有無可忽視的文學史意識，「敘述」一套充滿個人特色、相當有影響力的香港文學史故事。以下將會依次說明「論述」、「歷史」和「文學史論述」的意涵，由此闡釋本書為何及將會如何由文學史論述的角度研究也斯的香港文學評論。

「論述」(discourse，或譯「話語」)可以視為「理解事物和世界的方法」，⁴⁰是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核心概念，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拉康(Jacques

39 對這方面的詳細討論，請參考王家琪：〈文學翻譯作為評論：也斯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文學譯介〉，《中外文學》第47卷第2期(2018年6月)，頁125-179。

40 Marianne Jørgenson and Louise Phillips,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1.

Lacan, 1901-1981)、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等都提出了重點不同的論述理論 (theory of discourse)。「論述」被應用到跨度極大的不同學科和研究之中，然而其中的共通點是強調語言建構現實的力量。據王德威研究，「論述」本來是語言學概念，「指談話時，說話者 (speaker) 將其理念或訊息以一可以辨認而又組織完整的方式，傳送給一聽者 (listener) 的過程」，而傅柯擴大其定義，指稱「人類社會中，所有知識訊息之有形或無形的傳遞現象」，論述的特點是「製造一『完整』(finite)、有中心思想 (centered) 的幻象，以供聽者的迅速接納」，換言之是組織一個首尾完整的、情節鮮明的「故事」。⁴¹ 傅柯在《知識的考掘》(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提出論述由不同的「聲明」(statements) 組成，各種論述又組成了「論述形構」(the discursive formation)。⁴² 他在〈話語的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 概括了論述的多個特點，例如論述是具有「評論性」(commentary) 的，話語的產生都是對前已存在之話語的迴響與闡釋，⁴³ 所以任何論述都必定和其他論述息息相關。論述又是「排他」(exclusion) 的，是依賴其排斥和對立的事物來形成的。⁴⁴

傅柯的「考掘學」是一種「反歷史性的史學」，⁴⁵ 挑戰傳統以時間性、統一連續的體系為本的單一統合歷史 (total history)。他提出的考掘學是僅僅描述論述形構和知識話語的散播和變遷而不詮釋它們，挖掘一統歷史體系中的斷裂和縫隙，「意圖打破傳統人文學科模式，重新發掘深藏於各種思想、制度運作下的關係法則」。⁴⁶ 傅柯關注的是論述的形構，尤其是社會及各種體制如何以定義和排除的方式進行論述的行為藉此掌控權力，並研

41 王德威：〈導讀一：淺論傅柯〉，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出版，1993年)，頁 29-30。

42 傅柯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頁 116。

43 Michel Foucault, "Orders of Discours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0, no. 2 (April 1971), 12-13.

44 Foucault, "Orders of Discourse," 24-25.

45 王德威：〈導讀二：「考掘學」與「宗譜學」〉，《知識的考掘》，頁 41。

46 傅柯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頁 102。

究某種客體由於甚麼條件因素、怎樣的權威操作、在甚麼系統中成為論述的對象。⁴⁷ 研究論述是要「顯示它們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永遠是我們所知的一些規則所架構成的結果」。⁴⁸ 他並說明研究論述的幾項原則，包括「逆轉」(reverse)，揭破論述排除 (cutting-off) 以及稀釋 (rarefaction) 的部分；「外延」(exteriority)，注意論述的外延因素，甚麼令其出現及劃定其界限等等。⁴⁹ 比方說探討「為甚麼某一『聲明』而不是另一『聲明』出現」，⁵⁰「注意我們所研究的話語與其他同時存在或與其相關的話語間發生關係時，扮演甚麼的角色」，即是「話語位置的分佈秩序」。⁵¹ 歷史因而只是論述的總和，是語言闡釋的產物。⁵²「考掘學」不無理論上的疑難，⁵³ 但是傅柯對論述和歷史的顛覆仍然徹底改變晚近的文學史觀，深刻地影響了歷史研究，新歷史主義 (New Historicism) 即是其中顯例。

新歷史主義在八十年代流行一時，並為文學研究留下了一些重要遺產，這裏僅扼要介紹與本研究有關的概念。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和文學同屬一個符號系統，歷史的虛構成分和敘事方式同文學所使用的方法十分類似」。⁵⁴ 新歷史主義把評論家的角色推到最前方，強調評論的作用和影響，認為「批評者與本書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的『同謀者』關係」，反對解

47 同上注，頁 120-123。

48 同上注，頁 99。

49 Foucault, "Orders of Discourse," 21-22.

50 傅柯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頁 102。

51 同上注，頁 156-157。

52 盛寧：〈歷史·文本·意識形態——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批評和文學批評芻議〉，《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5期，頁 19-20。

53 王德威在其對傅柯的導讀之中就數次提出考掘學的理论問題，例如以話語運作取代了多個史學概念、考掘學宣稱要進行之「中立」「客觀」描述顯得可疑、在這套解構主義的學說之下卻包含結構主義式對深層規則的追求等等。參考〈導讀二：「考掘學」與「宗譜學」〉，《知識的考掘》，頁 52-54。

54 張京媛：〈前言〉，張京媛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 2、4。

構主義評論家「把本文看做是自己的病人」分析文本的隱秘的做法。⁵⁵ 新歷史主義者「注意產生文學本文的歷史語境」，「重新估價規範文學最初產生時的社會和文化」，「特別注重對闡釋語境的理解和分析」，並特別提出評論家在詮釋歷史時無可避免帶入詮釋當下的價值觀。⁵⁶ 新歷史主義因而徹底質疑了歷史的實體，把一切歷史視為「論述」，他們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和巴赫金的理論，研究重點從文本（text）轉向脈絡（context），「帶着一種對霸權概念以及對話語內部和言語間的鬥爭之觀念的不無裨益的強調」。⁵⁷ 他們對論述、權力、歷史的看法明顯繼承自傅柯，⁵⁸ 尤其是「試圖呈現被過去歷史排斥在外的團體的傾向」，⁵⁹ 以及從歷史佚事引出對經典的新解讀等做法，⁶⁰ 顯然都是後結構主義的策略。盛寧概括傅柯的史觀對新歷史主義的影響：

「歷史」不再被當作一種客觀的存在，而僅僅是一種「歷史敘述」或「歷史修撰」（historiography）〔……〕「歷史」的「文本性」被突出，原先一個大寫的、單數的「歷史」（History）被眾多小寫的、複數的「歷史」（histories）取代了〔……〕歷史既是文本，它也就應該受制於文本闡釋的所有的規則。⁶¹

55 同上注，頁2。

56 同上注，頁5-7。

57 伊麗莎白·福克斯—杰諾韋塞（Elizabeth Fox-Genovese）著，孔書玉譯：〈文學批評和新歷史主義的政治〉，《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頁57。

58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米家路譯：〈解碼福柯：地下筆記〉，《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頁109-143。弗蘭克·林特利查（Frank Lentricchia）著，肖明翰譯：〈福柯的遺產：一種新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頁144-159。

59 布魯克·托馬斯（Brook Thomas）著，程巍譯：〈新歷史主義與其他過時話題〉，《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頁84。

60 盛寧：〈歷史·文本·意識形態——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批評和文學批評芻議〉，頁24。

61 同上注，頁20。

當然新歷史主義有其限制，他們最初雖然是希望由解構主義及形式主義批評的風尚之中恢復歷史研究，最終卻取消了歷史研究的積極意義。新歷史主義不再流行，卻仍然留下影響的痕跡，提醒我們「歷史」具有「歷史編纂」及「歷史本身」的雙重意味。⁶² 文學及歷史研究者該如何面對新的歷史觀念？盛寧的說法值得引用：

我們從這樣一個角度去看歷史，並不是要把「歷史」理解成貶義的向壁虛構（這種誤解已經屢見不鮮），而是要去除「歷史」（文本）的神秘性，看到「歷史」自身的歷史性，看到「歷史」文本在形成的過程中如何受到歷史環境、認識條件和學術體制等各種作用力的制約。⁶³

我們不必激進地認為歷史沒有真實可言，放棄追尋歷史事實，新歷史主義讓我們注意到歷史編撰的過程以及個體（史學家、文學評論家等等）的角色，對於文學及歷史研究而言仍是重要的啟發。

文學史既是歷史書寫之一門，這些歷史學的討論自然也深深地改變了文學史研究，「文學史」的概念被徹底地重新審視。文學史也具有「歷史編纂」及「歷史本身」的雙重性，就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34-）對歷史的形容：「歷史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個文本、大文本（master text）或宏大敘述（master narrative），但是它除了文本或敘述形式以外是無法企及的。換言之，我們只能通過預先的文本手段（textualization）或敘述重構

62 也有歷史學者把「歷史」更精細地分成三個層次，亞諾德（John H. Arnold）認為：「我用『歷史編纂』表示書寫歷史的過程，用『歷史』表示這一過程的最終成果」，而「過去」本身「就像生活一樣無序、混亂、複雜」。亞諾德暗暗反駁新歷史主義的說法，「過去本身不是一段敘述」，「歷史是真實的，因為它必須與證據即歷史涉及的事實相一致，否則它必須表明為甚麼這些事實是錯誤的，需要修正」。但是無論如何，「歷史」與「歷史編纂」的區分仍然是後結構主義及新歷史主義留下最主要的遺產。亞諾德著，李里峰譯：《歷史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5及17。

63 盛寧：〈歷史·文本·意識形態——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批評和文學批評芻議〉，頁22。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才能夠接觸歷史。」⁶⁴ 文學史只有通過各種論述才能企及，即使文學史總是在「重寫」之中。內地學者針對文學史課題作了很多精彩研究，由官方主導的文學史編修工程及文學史所負載的意識形態與教育任務，令他們更為敏銳、急切要重思文學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上，自從 1988 年陳思和、王曉明等人倡議「重寫文學史」以來，不少學者都力圖拆解文學史的傳統概念，並提出異彩紛呈的文學史構想。至於在香港，面對九十年代以來內地編寫的香港文學史，本地學者也高呼要「重寫文學史」。迄今香港文學尚未有一部本地編修的文學史，然而在朝向香港文學史誕生的路上，研究不同學者的香港文學史論述形構是非常重要的起步工作，他們對香港文學各項課題、現象、作品的評論，都是為編修文學史奠基。

香港文學史的論述形構是在九十年代因應香港政治前途的變動而出現的，「香港文學史」忽然成為論述對象，各家爭相熱心敘述「香港故事」，在各種出爐的香港文學史論述之中，以內地學者最有組織和規模，也是被研究得最為仔細的。⁶⁵ 本地學者為了抗衡他們的論述，評論、史料收集與編選以至文學大系的準備工作陸續啟動，⁶⁶ 並警惕香港文學史的書寫應該謹慎進行，例如盧璋鑾認為「短期內不宜編寫香港文學史」、⁶⁷ 也斯說「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等等。⁶⁸ 在他們的批評之中，文學、文學史論述以

64 由引者中譯。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Historic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11, no. 1 (Autumn 1979): 42.

65 參考陳國球：〈收編香港——中國文學史裏的香港文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合編：《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21。王宏志：〈中國人寫的香港文學史〉，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出版，1997年），頁95-130。

66 參考樊善標：〈文學史「如何香港」的設想——鄭樹森、黃繼持、盧璋鑾香港文學「三人談」與陳國球《香港文學大系總序》〉，《政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16年6月），頁91-128。

67 盧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黃繼持、盧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74。

68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香港文化十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

及政治論述之間的關聯性明顯不過，不論是配合還是力圖擺脫政治主導論述，多能指出非文學因素（例如政治、經濟等）對文學史論述的影響，而這批本地的文學史論述及其研究又多是在後殖民理論及文化身份認同理論的範式下產生的。

綜合上述的理論啟發，我們可以嘗試重新想像香港文學史的可能形態。陳國球的文學史研究化用了傅柯及新歷史主義等理論分析文學史的敘事性，「文學史以敘事體的形式具體呈現於我們眼底」⁶⁹，「當中有的是包括敘事者、敘事體和接受者的一項敘事行動」。⁷⁰ 因此並不存在「客觀」文學史，也沒有所謂權威的史著，而只是許多敘述的集合：

同一段文學史就寄存於不同的敘事體，在不同社區保有不同的面貌。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再以輕蔑的口吻說文學史各種描述不外是「工具」、「手段」，以為文學史的「客觀事實」才是基礎、是骨幹、是真的「第一義」。我們要認真省察種種敘事體的本質，質疑它的支配地位，進而積極地深思這敘事體的操作方式有沒有改善的可能。⁷¹

也正因為文學史只是敘事體，它所敘述的故事就可以被質疑、審思。質疑的對象主要是長期作為意識形態附庸和教科書的文學史：

它的敘事體式必然具體了幾個特徵：

1. 敘事者表明所敘述的不是謊言，乃是真相；
2. 敘事者假設自己和讀者對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並不對等；敘事

69 陳國球：〈文學史的探索——《中國文學史的省思》導言〉，《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17。

70 陳國球：〈敘述、意識形態與文學史書寫——以柳存仁《中國文學史》為例〉，《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頁184。

71 陳國球：〈文學史的探索——《中國文學史的省思》導言〉，《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頁318。

者訪得了知識的火光，然後傳遞給蒙昧的讀者；

3. 基於不平等的地位，基於高度的自信，敘事體充滿從上而下的指導語態，藏有嘉惠後學的自慰心理。⁷²

1988年的「重寫文學史」浪潮正是要挑戰這些敘事體式。⁷³這些學者不再自稱傳達客觀的歷史真相，樂於宣佈「敘事體僅是一己之見的宣言，戳破了敘事者全能全知的神話」。⁷⁴例如陳思和提出要寫一部「個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它是不「全面」的，是有「偏見」的，它不適合作一部力圖公正解釋各種歷史現象並負有意識形態指導者責任的教科書。但話又說回來，這種「公正」的教科書又何曾有過呢？⁷⁵

陳思和希望陸續「有各種各樣的對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的解釋」。⁷⁶陳國球的文學史研究無疑也秉持着相似的批判精神，他澄清這種解讀前賢的文學史著作的方法並非為了指斥其不盡善之處，而是「只想說明文學史上的種種現象，有賴『文學史家』去梳理串連」，因此「當我們進行閱讀時，應該對敘述過程中的人為作用有所警覺」。⁷⁷

在這種新的文學史觀之下，我們應該放棄追求所謂「完整」、「客觀」、「終極」的幻象，改而期待眾數的、五花八門的「個人文學史」。而文學

72 同上注，頁319。

73 參考陳思和：〈關於「重寫文學史」〉，《筆走龍蛇》（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7年），頁106-120。陳思和、王曉明：〈「重寫文學史」專欄主持人的對話〉，《筆走龍蛇》，頁121-152。

74 陳國球：〈文學史的探索——《中國文學史的省思》導言〉，《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頁320。

75 陳思和：〈一本文學史的構想——《插圖本20世紀中國文學史》總序〉，陳國球編：《中國文學史的省思》（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頁51。

76 同上注，頁55。

77 陳國球：〈敘述、意識形態與文學史書寫——以柳存仁《中國文學史》為例〉，《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頁188。

史論述的研究正是要追問文學史敘事體的特點、發言立場與對象、被認可或成為主導論述的原因、作為「故事」它的情節結構安排，甚至它所沒有敘述的故事部分等等，「積極地深思這敘事體的操作方式有沒有改善的可能」。⁷⁸也就是說，我們期待不應只是「一部」本地學者編修的文學史，而是異彩紛呈的、眾數的「個人的香港文學史」，而研究現有的香港文學史論述正是重要的起步，例如也斯即在其中提出了一套他的香港文學史論述。

也斯畢竟沒有寫出一部以「文學史」命名的著作，在把他大量的香港文學和文化評論集合起來視為文學史論述來研究之前，我們還需要先拓寬對「文學史」體式的想像。這點或者可以參考陳國球對多部中國文學史的詳細剖析。在他的研究之中，有兩部文學史的寫法較為特別，一部是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多被指是粗疏、不夠嚴謹；另一部是葉輝《書寫浮城》，並非文學史而是評論集。陳國球認為這兩部著作顛覆了傳統文學史的規格，其中有兩點對研究也斯文學史論述很有啟發：（一）文學史可以充滿個人性和主觀性而不減其學術價值，（二）非歷時式、論文集合式的一組文本未嘗不可視為「文學史」的其中一種面目。

先談談文學史的個人性。也斯追求「越界」的評論寫法，他的文學史論述當然也是「越界」的了，他提出的香港文學史論述是一部個人的、主觀的、抒情的文學史。陳國球就嘗試論證主觀的寫法和個人回憶對文學史論述的價值。例如司馬長風的著作中敘事者的聲音經常出現，⁷⁹他所倚靠的文學史材料、發掘未獲當時其他中國現代文學史承認的作家的憑據，「不一定是司馬長風單憑爬梳整理存世文獻而得的新發現，個人往昔的記憶可能是更重要的根源」，而他取捨材料、敘述故事時也「摻進了許多司馬長風的個人經驗」。⁸⁰葉輝的《書寫浮城》也可見作者對七十年代個人經驗的重視，

78 陳國球：〈文學史的探索——《中國文學史的省思》導言〉，《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頁318。

79 陳國球：〈詩意與唯情的政治——司馬長風文學史論述的追求與幻滅〉，《中外文學》第28卷第10期（2000年3月），頁104。

80 同上注，頁105-106。